

历史上的福安三贤

福安城关的龟山下，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三贤祠，大门两边的对联写道：

首蓐望餐侍讲东宫清廉重典范
木棉除佞恸哭西台忠义仰高风

上联说的是唐代薛令之，下联说的是宋代郑虎臣与谢翱。这三位历史名人都出于福安，被称作福安三贤。三贤祠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修建的。

春夏之交，乍暖还寒，笔者到了福安，听说三贤祠就在不远处，便慕名前往。面对二楼正厅供奉的三个神祇牌，我虔诚地凭吊了一番。

唐宋的历史毕竟离现在太远了，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他们的遗物；但历史又是不能轻易忘却的，今天听他们的生平故事依旧是那样的扣人心弦。

薛令之：一生清贫廉洁

唐代大文豪韩愈曾这样说过，“闽越之人举进士，由詹始也”。詹，则欧阳詹，晋江（一说南安）人，与韩愈同是唐德宗贞元八年（792年）的进士。然而韩愈说错了，福建的第一个进士并非欧阳詹，而是薛令之。后者于唐中宗神龙二年（706年）举进士，比前者早了86年。

薛令之，字君珍，号明月先生，唐长溪县廉村（今福安市廉村）人。我曾两次到过那里，留下的印象是，四面青山，披着薄薄的雾纱；一溪绿水，流向邈邈的远方，环境有点像世外桃源。但是，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某

一天，这里却从遥远的都城长安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——“薛令之老爷高中进士”。按今天的话说，这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新闻，当时的小村庄无疑是沸腾了。

然而薛令之毕竟是从山沟沟出来的，没有任何政治背景，官运并不亨通，只担任小小的左补阙之职，而真正的工作是东宫侍讲。说白了，就是与著名的诗人贺知章一起，陪太子李亨读书。当时把持朝政的宰相李林甫，擅权误国，欺压百姓，对同朝的异己极尽打击之能事。薛令之是位老实忠厚的人，不愿意巴结权贵，兼之太子又与宰相不和，这让他常常受到李林甫的冷落与排挤。有一天，薛令之发现宫苑里紫绿色的苜蓿长得很茂盛，不禁联想起李林甫平日对他的态度，便在墙上写下了《自悼》一诗。诗云：

朝日商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
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。
饭涩匙难绾，羹稀箸易宽。
只可谋朝夕，何由度岁寒？

这首诗显然是针对李林甫的，可是唐玄宗李隆基看到了，却有他自己的见解。这位“重色思倾国”的风流皇帝认为，薛令之的诗有“讽上”的含意，便针锋相对地在旁边题写道：“啄木嘴距长，凤凰毛羽短。若嫌松桂寒，任逐桑榆暖。”意思是，这里既然不好，你就到别处去吧。薛令之一看，知道皇上生气了，有问罪的意思。他感到十分委屈，因为他不敢也根本没有想要讽上。怎么办呢，去解释吗？不行，越解释可能越是得罪。最终，只能以身体不好为由，“谢病东归”。

回到老家的薛令之，一直过着穷研经书、抱瓮灌园的艰苦生活。玄宗知道后，大概也觉得自己当时做得有点过分，想补救一下，就让长溪县当局以岁赋资助他。薛令之计月而受，绝不多取一分一毫。唐至德元年（756年），李亨（唐肃宗）即位，第二年从灵武回到长安，想起了薛令之，思及过去的师生情谊，准备召他入朝，可是这位一生清贫而又廉洁的帝师，早已在几个月前就离开人世了。肃宗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叹息不已，当即敕命，

御赐薛令之的故乡为“廉村”，村前经过的溪流为“廉溪”，附近的小山为“廉岭”。

薛令之生前的《明月先生集》和《补阙集》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他的诗也只有《自悼》和《灵岩寺》两首入选《全唐诗》，因此后人很难对他的文学艺术创作成就进行评论。但是，作为八闽第一进士，他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中原而言，可谓石破天惊，证明曾经被认为是偏远的蛮夷之地福建，也有杰出的人才，也能举进士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不管当官还是为民，薛令之两袖清风，一生廉洁，为后人做出了榜样。他的故里以“廉”为名，也成了人们心仪的地方，特别是在廉政建设的今天，更有其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。

郑虎臣：一身浩然正气

由于在漳州木棉庵处死大奸臣贾似道，郑虎臣的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可谓如雷贯耳，但真正问起他的经历，能说出子丑寅卯的可能不多，而他的籍贯在哪里，知道的人就更少了。

郑虎臣，字廷翰，又字景兆，长溪县柏柱南山（今福安市溪柄镇南山洋头村）人，生于南宋嘉定十二年（1219年），从小习武，又好读书，是个武举人。曾因父亲郑坝的冤案，受株连充军边疆，后遇赦放归，任浙江会稽（今绍兴）县尉。宋开庆元年（1259年），元军大举入侵，奉命率兵救鄂州（今湖北武昌）的右丞相贾似道贪生怕死，私自与元军求和，答应称臣纳币，但此时忽必烈得到蒙哥汗的死讯，急于北返争夺汗位，来不及签订具体和约，就匆匆撤军。贾似道谎报军情，说是由于他的抗击，才使得元军撤退。宋理宗深信不疑，下诏褒扬，封少师、魏国公。贾似道从而大权在握，把持朝政十几年，南宋小朝廷也因此更加糜烂。宋德祐元年（1275年），元军再次南侵，攻陷鄂州，贾似道所带的队伍一战即溃，他自己则逃回扬州，令朝野震惊。当时许多大臣上疏请斩贾似道，恭帝的母亲谢太后虽几番包庇袒护，终因民愤难平，只得把他降为高州（今广东茂名、高州一带）团练使，贬到循州（今广东龙川、和平、陆丰一带）安置。

按照惯例，被贬的官吏必须有人押送。郑虎臣主动请缨，承担重任。其时，贾似道已转押到福建的建宁，随身带着许多金钱和珠宝，还有成群的妻妾侍候着。郑虎臣觉得太过分了，起解前便来个下马威，遣散全部侍妾，将财物施舍给民间。盛夏途中，他让轿夫打开轿盖，晒得轿中的贾似道汗流浹背，头昏脑涨。最绝的是，他还将贾似道的罪行丑事编成歌曲，让轿夫们反复唱，一路羞辱这个老贼。

那年的8月，郑虎臣一行到了漳州。知府赵介如原是贾似道的门生，一见恩公来了，便设宴款待。但此时的贾似道已被郑虎臣教训得怕了，不敢就座，说是“天使在上，罪臣哪有坐席之理”。郑虎臣也不推辞，理直气壮地坐在上宾位上。这顿饭让赵知府吃得很不爽快，但他还是想多留贾似道一些日子。郑虎臣不答应，第三天起程，临行前，赵知府送给贾似道许多钱物，都被郑虎臣以行李过重为由寄存下来。

出了漳州城，郑虎臣心想，贾似道把持朝政时间长，培植了许多像赵介如这样的亲信，接下去他们还会耍花招，尤其是朝中的谢太后，本来就不愿意处置贾似道，很可能有一天还会放了他，如不及时让老贼死在路上，后患无穷。于是走到郊外的木棉庵，决心杀掉贾似道。老贼一看，吓得地上乱爬，先是苦苦哀求，继而狂叫：“你不能杀我，杀了，是要获罪的！”郑虎臣大义凛然地说：“为了天下老百姓，我杀掉你，即使获罪，也不怕！”说罢，将其处死。

为民除奸，本该得到褒奖，郑虎臣却遭到了贾似道余党的构陷，宋景炎元年（1276年）入狱，不久即遭杀害。

出于对郑虎臣的景仰，我专程来到洋头村（今称榕头村）。村前有郑虎臣的塑像，背后是一棵古榕树，俗称“九头榕”。传说当年郑虎臣含冤被杀，这棵榕树突然长出八个头来，暗喻忠良是杀不绝的。如今，古榕的主干有林业部门1999年挂的牌子，树龄是890年，它的周围还有好几株由根须入土而成的树，树龄都比主干短，证明这个传说有一定“依据”。不过，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郑氏祠堂里署名“文山”的联句：

作正气人都为名教肩任
到成仁处总缘大义认真

这是文天祥写的吗？不错。文天祥当年奉诏由甘棠港进入福安百辟岩，集勤王之师。百辟岩离洋头村只有三十多里，当他听到郑虎臣昭雪后归葬故里时，便挥毫写下联句表示敬意。

站在文天祥所撰的楹联前，一股浩然正气不禁从心中油然而升起。

谢翱：一代诗人之冠

福安人似乎与文天祥有着特殊之缘！

郑虎臣诛贾似道名垂青史，文天祥为之写下了充满正气的楹联，谢翱则追随文天祥举兵抗元，之后又写下许多悼念文天祥的诗文。

谢翱，字皋羽，号晞发，又号宋累，宋理宗淳祐元年（1249年）生于长溪县樟檀坂（今福安市晓阳镇），后随父谢钥迁徙浦城。年轻时闭门苦读，博览群书，先后两次赴京城临安（今杭州）应试，都没有考取。对此他并不在乎，而是决意以文章成大业，可那时元朝大军压境，南宋已到了风雨飘摇的末期，哪里还有可安心读书或做文章的地方？

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谢翱仿效江东提刑谢枋得的做法，在浦城建立了一支抗元的民军。为此，他卖掉田地，尽倾积蓄，以充军饷。景炎元年（1276年），文天祥临危受命，大举勤王之师，谢翱率民军投奔文天祥，因他既有文才又懂军事，被署为谏议参军，从此驰骋沙场，万死不辞。

由于双方的力量悬殊，抗元军队节节败退，但文天祥一直坚持作战。为了建立抗元的最后根据地，他让谢翱先行入粤。两人在赣郡的章水边惜别，文天祥将自己珍爱的一方端砚送给了谢翱。

谢翱与文天祥分别后，率乡兵暂屯于循州南岭。虽然只有一个多月，却因不能在文天祥的身边而怅然，写下了《秋夜词》：

愁生山外山，恨杀树边树。隔断秋月明，不使共议处。

之后不久，即祥兴元年（1278年），文天祥的军队遭到元将弘范的偷袭，兵败五坡岭（今广东海丰北），被俘押往大都。三年多的牢狱，正气凛然，坚贞不屈，终于在元至元十九年（1283年）1月9日被杀。

文天祥殉国后数月，谢翱听到噩耗，悲怆万分，作文祭拜恩师曰：“章贡之别言犹在耳，水寒天空老泪如霜。”

宋亡之后，谢翱流匿于两浙，终身不仕，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诗作，尤其是对文天祥的怀念，绵绵不绝。元至元二十年（1284年）初，他和几位朋友到吴郡姑苏（今苏州）的夫差台，哭祭文天祥，数日后作《春日寄书代乡人答》：“故垒夫差地，遥知哭为亲。”元至元二十三年（1287年）十二月，文天祥殉国四周年，他独自到绍兴登稷山越台哭悼，并作《哭所知》：“雨青余化碧，林黑见归魂。欲哭山阳笛，邻人亦不存。”元至元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十二月，文天祥殉国九周年，他约友人到富春江上游的严子陵祠，同登西台，设文天祥木主祭奠，恸哭再拜，并作楚歌为文天祥招魂——“魂朝往兮何极，暮归来兮关塞黑，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。”归途，作《西台哭所思》，诗中充满对文天祥的伤悼之情：

残年哭知己，白日下荒台。泪落吴江水，随潮到海回。

故衣犹染碧，后土不怜才。未老山中客，惟应赋《八哀》。

身处元朝政治高压之下的谢翱，一直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，尤其是抗元复国的理想无法实现，经常处于逃匿状态，更使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损害。元贞元年（1295年）8月，这位文天祥的忠实追随者终于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，告别人世，年仅46岁。

谢翱是宋、元之交的著名诗人，他的诗作收在《晞发集》，有很高的成就，当年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。明代文学家杨慎称他是“宋末诗人之冠”，另一位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则赞美其为“南宋翹楚”。读谢翱的诗可以发现，他的风骨慷慨悲凉，继承了中国士人忠君爱国的传统，更得益于追随文天祥举兵抗元斗争的磨炼。这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值得后人珍惜。

名人与花卉

花卉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种赏心悦目的植物，美丽、鲜艳、芬芳、富有灵气，几乎没有人不爱花。千百年来，人们种花、赏花、护花、写花，与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中国人对花的认识很早，三千多年前就有咏花的诗歌出现，如《诗经》的《桃夭》，以花之美祝福男女婚姻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楚国大诗人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交织使用花草，不下一二十种，这些花草信手拈来，成为他抒发情怀、寄托理想的载体。晋代大诗人陶渊明饮酒赏菊，悠然地唱道：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。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。”（《饮酒二十首》其七）

最有意思的是，无论中外古今的人，几乎都认为花与美，花与女人，花与爱情，是微妙地联系在一起的。

“思见春花月，含笑当道路。逢郎多欲摘，可怜持自误。”（南朝乐府《子夜四时歌·春歌》）

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；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（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）

“啊，但愿还能装进我的爱情，我爱情的墓畔有宁馨的花朵滋生。”（海涅《用玫瑰、柏枝和金箔片》）

在中国，花还被赋予许多不同的品格，如岁寒三友之一的梅，笑傲霜雪，是富有气节的表现；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莲（荷），乃高洁的象征；兰花则具有君子之风：“芝兰生于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困穷而改节。”最有故事性的当数牡丹。据说唐代武则天时，有年冬天，京城长安一片萧瑟。女皇很不高兴，下了一道圣旨，让御花园里所有的花同时开放，还把

诏书烧给花神，以作通报。第二天，百花齐放，唯独牡丹依然只有枯枝败叶。武则天一看大怒，烧了牡丹。但是任凭你怎么烧，牡丹还是不肯开花。女皇只好将其逐出御花园，贬到洛阳。从此洛阳牡丹独步天下。这个传说意在告诉人们，牡丹不仅有“国色天香”之貌，还有宁死不屈的精神。

对花卉情有独钟的漳州名人

地处福建南部的漳州，种花历史悠久。早在唐代陈元光治漳时，就开始引进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与岭南的花卉。一千多年来，这里一直是我国的重点花乡。据《漳州府志》载，市郊的长福村，“居民不种五谷，种花为业”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戎马一生又非常爱花、写过近四十篇咏兰诗的朱德委员长曾到这里参观，他高兴地说：“你们每家每户以种花卖花为业，那不就是百花村了吗？”从此，这个新的村名便传开来了。如今村口大门横匾上的“百花村”三个字，则是老一辈革命家陆定一1980年来此参观时题写的。

不仅百花村因花闻名于世，漳州的其他地方，也处处让人感受到花的氛围，花的气息以及谈论花的家长里短。这也难怪，当地人对花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，漳州的名人雅士，更是情有独钟，常常用手中的笔，写花、画花、咏花。近现代的林语堂和杨骚，便是他们中的代表。

林语堂，1895年出生于平和县坂仔镇，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漳州籍作家，学贯中西，著作等身，1976年病逝于台北。他的英文长篇小说《京华烟云》（又译《瞬息京华》）改编、拍摄成电视连续剧，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过。

这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有篇文章——《大自然的享受》，用相当长的篇幅谈论“花与花的布置”，显示出其渊博的知识。他认为，花的享受和树的享受一样，第一步必须选择高贵的花，以它们的地位为标准，同时以某种花与某种情调和环境发生联系。首先是香味，此外又有色泽，外观。花怎样插在花瓶里，也与花的选择和品第同样重要。这种艺术至少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时候。他还说，爱花的人们最容易使这些花在心中构成各种不同季节的图画，有的如冬青树代表圣诞节那样。